

二十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 兴起发展中的日本 影响因素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XINGQI
FAZHANZHONG DE
RIBEN YINGXIANG YINSU

靳明全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 兴起发展中的日本 影响因素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XINGQI
FAZHANZHONG DE
RIBEN YINGXIANG YINSU

靳明全◎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靳明全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
(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论丛书)
ISBN 7-5004-4710-8

I. 中… II. 靳…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455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从社会要求与外来影响的相互撞击中产生并发展的。它与世界文学潮流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它是开放性的。针对这个特点，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专题研究，比较文学方法得天独厚。

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论著，绝大部分针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相对而言，至今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有些方面，还是一片处女地。

20 世纪初期至 30 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论述这个特殊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忽略以下的事实：被我们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者，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田汉、张资平、欧阳予倩、刘呐鸥、夏衍、胡风、李初梨以及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等，均留学过日本。这些大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由他们分别发起、指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话剧运动、左翼文艺运动以及由他们分别发起成立、领导的创造社、新感觉派，均与日本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上述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入手，论述出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则足以概括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甚至能概括出中日近现代文化发展史。这也是本著选题的价

值所在。

本著的主要内容是依据翔实的资料（有些资料源于著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等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中国新文化运动、话剧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及创造社、新感觉派的内容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新感觉派、新派剧、歌舞伎等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中日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兴起和发展中的许多相似处，并通过影响类型、流传途径、接受方式等的考证，总结出近现代日本文学、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这种影响的史实、途径以及因果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本著比较科学地论述了日本文学、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作用。从正面影响来看，日本文学、文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加快了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步伐。从负面作用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出现过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相似弊病，走了不少弯路，从中也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限性。这些问题论述清楚了，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比较文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也不乏借鉴作用。

明全君是一位很勤奋的学者，1993年至2001年已出版了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学术专著五部。当2001年他向我提出读我的博士生时，我欣然同意。在川大读博期间，他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中日比较文学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四篇，为我主持的一项国家项目撰写了“日本文论”内容的论文达12万字。2003年12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顺利通过了答辩，本著正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

主干而撰写的。作为他的博士指导教师，我衷心祝愿他在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是为序。

曹顺庆

2004年3月于川大花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展中的	
“日本影响”因素	(1)
第一节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接受的 思想文化内容	(1)
第二节 日本近代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相关点	(17)
第三节 大正德谟克拉西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示	(26)
第二章 从创造社到中国新感觉派	(33)
第一节 创造社、中国新感觉派形成的日本背景	(33)
第二节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	(35)
第三节 “私小说”的借鉴	(45)
第四节 “新感觉派”的移植	(62)
第五节 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	(71)
第三章 中国话剧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76)
第一节 春柳社同人在东京的主要活动	(76)
第二节 欧阳予倩戏剧与日本歌舞伎	(81)
第三节 创造社同人艺术探索对日本戏剧的观照	(87)
第四节 田汉与日本戏剧	(96)
第五节 艺术剧社的中坚	(106)

2 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第六节	夏衍与藤森成吉戏剧比较	(108)
第四章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发展中的	
“日本影响”因素		(122)
第一节	左翼文人译介马列文论	(122)
第二节	1928 年中国革命文学兴起的日本观照	(133)
第三节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	(151)
第四节	胡风对青野季吉的超越	(164)
结 论		(171)
附录一	鲁迅与有岛武郎创作观念之比较	(173)
附录二	郭沫若早期诗歌与日本和歌、俳句之比较	(191)
参考书目		(216)
后 记		(222)

第一章

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展中的 “日本影响”因素

第一节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 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

1915年9月至1919年5月，习称这段时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和任务。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在运动前期是完全遵循着这个宗旨并逐步完成这个任务的。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习称这段时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这段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分歧斗争日趋突出，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坚持了反对旧道德、旧文学的战斗，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依然不同程度地遵循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里主要存在着以下五种倾向：

首先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一项伟大的开拓性的工作，但他俩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难免宣

传了含有较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李大钊的“互助进化论”，陈独秀的克鲁泡特金式的“互助论”及改良主义等。他俩宣扬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依然坚持着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内容。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继续张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提出“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在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刊物上，陈独秀发表《男系制与遗产制》、《解放》等文，他与李大钊相呼应，继续阐述反对封建文化的主张：“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底‘三从’大义”，“这是社会制度上的缺点之一，也是要解决的社会底重大问题”。“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到解放底圆满效果。”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在李大钊、陈独秀这段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为数不少，可见，李大钊、陈独秀两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之际，依然树立着新文化运动前期所树的旗帜。

其次是以胡适为代表，极力宣扬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胡适于1919年6月挑起了新文化阵营内部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但作为运动的发起者、指导者之一，他在这段时期里，依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内容。1919年11月，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还联名发表《新青年杂志宣言》，重申了新文化运动要重视自然科学与实验主义哲学，要破除迷信与幻想等内容。

再次，以周作人为代表，极力宣扬日本的新村主义，推行中国的“新村运动”。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进行思想改革，主张“缓进的革命”，这也是周作人的新村思想的主要内容。他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的理论来张扬人道主义，依然是在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内容。

还有，以鲁迅为代表者，主要以自己的作品显示着文学革命的实绩。那段时期，鲁迅的作品特别地重视宣扬以“为人生”作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例如小说《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及杂文《随感录》等，其内容仍然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

此外，钱玄同、吴虞等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起指导者，在这段时期里，不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彼此有何差异，但坚持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方向却是一致的。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交错复杂的。但是，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这也是1919年前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任务的继续和深化。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必然性，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在新文化运动阵营里出现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学说、观点，这些不同的学说和观点，虽然相互抵牾，但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前提之下的新文化阵营里的各种不同的学说、观点，谁也不能包容谁，谁也不能替代谁，谁也不能支配谁。真的能够达到一种学说、观点去包容、替代、支配其他学说、观点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就不可能存在，或者说，以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为旗帜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为什么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里（特别在运动后期）存在着主张的差异，甚至于主张的对立的情况之下，还能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宗旨，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任务而协同作战、共同奋斗呢？笔者认为，从考察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的文化素质形成的来源中可以得到回答。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名存于史册的不少，但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有以下七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吴虞。这七位人物除胡适外，其余都是20世纪初期的赴日留学生。

陈独秀22岁时于1901年11月到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先进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后于1902年9月入日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军事。

李大钊24岁时（1913年）赴日本，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

鲁迅21岁时（1902年）赴日本，先读于日本弘文学院，后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周作人21岁时（1906年）赴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特别预科、立教大学文科。

钱玄同19岁时（1906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

吴虞33岁时（1905年）赴日本，考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四科专攻法学。

以上六位人物，除吴虞岁数稍大一点儿外，其余留学日本时都很年轻，也正是他们接受新的文化思潮，形成自身的文化结构，构建并逐步确立世界观的最佳时刻。他们留学日本，日本文化以及盛行于日本社会的种种西方近代思潮，必然会给他们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胡适亦然，胡适于1910年（时值19岁）赴美留学前就读于由从日本学成归国的学生创办的中国公学。留日

归来执教的先生，对胡适的身教言传，自然不乏日本文化的内容。

任何一项历史性的运动都是由当时的杰出人物发起和指导的。这些杰出人物自身的文化素质（即他们接受并确立的人生观和文化知识结构等），是他们发起指导的历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运动的某阶段还左右着运动发展的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中国戊戌变法运动的发起指导者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中的对中国封建传统道德的强烈的认同感，致使他们发起指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走着热闹一时、急骤短命的历程。又如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发起指导者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中的开化进取、发奋革新精神，使他们指导的明治维新运动成为日本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向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既然历史运动的发起指导者自身的文化素质于运动的兴起发展是如此的重要，那么，考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就应该认真考察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的自身的文化素质。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的文化素质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其接受并确立人生观及文化知识建构的最佳时期里是在日本留学。并且，他们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即发起指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所以，考察他们留学日本时所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不仅能窥视到他们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所具有的文化素质特征，而且能探寻出他们留日时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之关系。

那么，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接受了哪些思想文化内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接受了盛行于日本社会的西方近代思潮——自由平等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赴日留学前，日本经过了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启蒙文明开化运动的中心思想是西

方的“天赋人权说”，把“人权”作为“天赋”来加以肯定。福泽谕吉《劝学篇》的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作为日本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弘扬“天赋人权”的代表理论，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后来，以“天赋人权说”为基础兴起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极力主张民权主义：“……日本帝国的人民，就是说，三千多万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应各享有其一定的权利，用以保存生命，维护自主，努力业务，增长福利，而为独立不羁的人民，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权利不是威权所能夺取，不是富贵所能压制，这是上天平等地赋予人民的，也是人民所愿意保有的，所以人民应该为它勤勉奋斗。”^①可以说，自由民权思想在日本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基础的，那就是反抗封建专制的各种反人性的压迫和桎梏，促进人民对于“天赋之权”——自由、平等的自觉和发扬。日本自由民权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近代的爱国主义。日本自由民权论者反复强调：“人民必须关心国事”，“国家必须发扬民权自由”，“不依靠人民的自主自由和宪法，国家就不得巩固”，“不发扬民权就不能发扬国权，保持独立；专制政治最后不得不亡国卖国。”^②

宣扬天赋人权，提倡自由平等，弘扬爱国精神，这些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赴日留学时接受的主要思想文化内容。

1901年5月，留日学生秦力山、沈之翔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倡推翻清王朝。同年11月，陈独秀到了东京，他很快响应《国民报》主张，接受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新学说。1902年9月，陈独秀加入了留日志

①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4—75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

士秦毓蓁、张继等发起的新团体——青年会，成为留日学生界团体中揭发民族主义之先驱者。

李大钊留学日本较陈独秀晚，留日期间，他比较突出地宣扬了西方自由平等学说：“顾此适宜之政治，究为何种政治乎？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先进国民之所以求此政治者，断头流血，万死不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经年郁茂以有今日之盛。”^① 在这里，李大钊宣扬自由平等学说，连用语“民权自由”也是“自由民权”的套用。自然，他在此文中写的“先进国民”主要指的是日本国民。可见，日本盛行的自由民权说对他影响之大。观照日本，李大钊宣扬自由民主精神仍然根基于他的爱国心，恰如他在此文中写的“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渴求在中国大地开放自由平等之花。

鲁迅留日时接受的西方自由平等学说在其留日时写的论文中已有论述。例如，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对心向往之的拜伦描写道：“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崇尚拜伦式的为独立自由人道而战的精神，正是鲁迅留日时接受的自由平等学说的内容之一。又如，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提出了反对封建束缚、解放思想、唤起民众的纲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个纲领也是鲁迅留日时接受的自由平等学说的内容之一。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时所接受的自由平等思想与日本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自由民权思想是基本相同的，它们都是侧重于启迪国民，

①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158页。

提高国民的自由平等意识和为独立自由战斗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接受的自由平等思想还带有日本的一个特色，就是启迪国民的自由平等意识之际，强调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李大钊在日本时宣扬自由平等精神目的在于“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①鲁迅在日本宣扬自由平等学说目的在于通过“立人”达到“立国”，促进“国人对于维新（指日本明治维新——引者注）的信仰”。^②达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③陈独秀说：“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④联系他的同人在日本留学所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可见陈独秀说的是事实，那就是在自由平等精神与爱国精神相结合方面，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接受日本的思想文化内容与日本的启蒙文明开化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内容达到了一致。

第二，接受了日本社会的“人的思考”的社会意识。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国与国是平等的，但如果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前提，“一国独立”是“一身独立”的必然结果。福泽所谓“一身独立”，主要是启迪国民的个人主体的自觉，这也是对“人的思考”

①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③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载《鲁迅杂文·小说·散文全集》（四），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9页。

④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的社会意识，是对日本长期的封建社会束缚人性的愚昧现象进行反拨，也是对西方近代思潮“人的发现，人的觉醒”的呼唤。但福泽所谓的“一身独立”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个前提，“一身独立”要达到“一国独立”，实际上是强调日本人民需要树立近代统一国家的观念。福泽谕吉的这个命题在日本明治社会中深入人心。然而，日本明治社会向大正的过渡走的却是“一国独立、一身独立”的路程。明治社会首先是国家的统一独立，形成了强烈的国民意识，经过自由民权运动后进入大正社会，在市民的自由主义“个人意识”与绝对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国民意识”相互矛盾之中，才表现出日本近代的个人自觉，大正文化显示出“国民意识”的薄弱和“个人意识”的加强，表现出了“人的思考、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为主要内容的“一身独立”精神。自然，这也是明治时期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果。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时所接受的日本对“人的思考”的社会意识是建立在福泽谕吉“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理论基础之上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形成他的“立人”、“立国”思想。他认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人张，沙聚之邦而之转为人国”。^① 中国要进化，要发展，首先要立人，在“立人”的基础上进而建立“人国”，这个“人国”就是日本式的强国，但鲁迅特地称为“人国”，说明他的着眼点在人。重点在于“一身独立”（“其首在立人”），只有“一身独立”，中国国民达到理想的人性，中国才有救，舍此，中国的独立则无意义。鲁迅留学日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3页。